

中国趋势报告

[英] 乔治娜·怀德 Georgina Wilde 著
肯·戴维斯 Ken Davies

- 走向2010年的中国
China to 2010
- 1997年后的香港
Hong Kong after 1997



国防大学 2 071 324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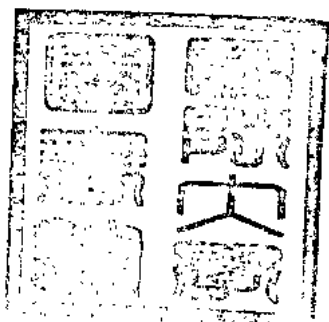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经济学家》趋势研究译丛

中国趋势报告

〔英〕 乔治娜·怀德 Georgina Wilde 著
肯·戴维斯 Ken Davies

- 走向2010年的中国
China to 2010
- 1997年后的香港
Hong Kong after 1997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趋势报告 / (英) 怀德, (英) 戴维斯著; 雷达、郑超愚等译校,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5

(《经济学家》趋势研究译丛)

ISBN 7-5011-4854-6

I. 中… II. ①怀…②戴…③雷… III. ①经济发展趋势 - 经济预测 - 中国
②社会发展 - 社会预测 - 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203 号

China to 2010

Hong Kong after 1997

Copyright © 1997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中国趋势报告

(英) 乔治娜·怀德 著
肯·戴维斯

吴顺虎 王检贵 译
雷 达 郑超愚 译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3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54-6/F·703 定价: 28.00 元

60/88-6

《〈经济学家〉趋势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黄泰岩 郑超愚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芳 邹正方 郑超愚 黄泰岩 黄隽 雷达

特邀编辑

刘家杰 徐兴堂 崔新健 林罡

总 序

经济学家情报社(EIU)自创建以来就与国际上主要跨国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通过就影响跨国经营的关键问题发表高质量的分析和建议报告,确立了自己作为指导跨国公司管理国际经营的著名研究、咨询机构的地位,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关政治经济趋势、政府法规、商业开发、公司实践和专有技术的世界性权威信息源。

《经济学家趋势研究译丛》系列秉承经济学家情报社真实客观而敏锐超前的研究传统,涵盖了中国经济、跨国公司、商业风险、工作流程、学习功能、电信技术等广泛领域,在系统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技术和组织的未来趋向,对于我们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认识未来进而同时从国家、产业、企业层次实施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受新华出版社委托,我们翻译了经济学家情报社的趋势研究译丛系列,并且根据研究报告主题的内在联系予以重新编排,辑成《中国趋势报告》、《未来组织设计》、《全球信息战略》和《跨国公司在华》四本。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经济体制转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深化三重协同转型的成功范例,而香港经济在 1997 年回归祖国后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正在全面恢复。《中国趋势报告》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政策的策划、实践和完善过程,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初步总结中国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意义,并且深入剖析了 21 世纪中国经济(包括香港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国内体制与政策问题以及国际机遇与挑战,给出了切合中国实际而且具有前瞻意义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安排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企事业组织都无法避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再造新的竞争优势。《未来组织设计》与《全球信息战略》将分析视角转换到 21 世纪企业结构的自适应调整问题上,着重探讨了如何指导企业设计灵活而健全的组织系统和信息战略,不仅能够激励创造性工作而有效地跟踪技术进步,而且能够约束投机性行为而有效地抵御商业风险,在先进的通信网络支

持下作最优化工作流程，最终成为集合新知识发现、新技术开发、新文化策源与全社会培育诸功能的市场竞争优胜者。

《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书提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吸引外资政策演化和各主要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直接调查资料，无论是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先行者还是对于准备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后来者，都可以有所学习和借鉴而成功推进其中国市场业务。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趋势报告》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对中国经济前景总体上持乐观态度，认为 21 世纪中国经济（包括香港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繁荣而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地区经济增长极，能够为国内国际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但由于受到思维方式、观念、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对中国国情深入的认识，本套译丛提出的观点以及对未来相关领域的研判，无不有偏颇失当之处，希望读者能明察。

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新华出版社和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给予悉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受学识和时间所限，虽经反复校核，本书翻译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谅解。书中所有错误和遗漏，均由校译者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黄泰岩

2000 年 5 月

目 录

总序	(1)
----------	-------

走向 2010 年的中国

第一章 引言	(3)
第二章 经济基础	(7)
供给面	(7)
需求面的 GDP	(17)
增长阶段	(19)
通货膨胀控制	(24)
增长的源泉	(28)
财政政策	(34)
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	(39)
外国投资政策	(45)
商品贸易与外部账户	(48)
货币问题	(59)
金融基础	(64)
第三章 社会性	(68)
社会平等的度量	(68)
农村问题	(71)
城市问题	(76)
失业	(77)
人口压力	(80)
第四章 发展议程	(84)
政治稳定	(84)
果断对外	(86)
再造国有经济	(89)

投资增长	(99)
保持市场稳定	(101)
制约因素	(102)
第五章 展望 2010 年	(106)
国际环境	(106)
国内政治环境	(108)
经济政策	(110)
增长和经常账户预测	(116)
2010 年的中国	(124)
主要参考文献	(126)
作者简介	(127)

1997 年后的香港

第一章 序言和内容提要	(131)
第二章 背景介绍	(134)
香港的政治体制	(149)
第三章 经济背景	(155)
第四章 政治和社会的过渡	(168)
第五章 1997: 经济的过渡	(187)
银行业	(193)
境内债券市场	(197)
港口的发展	(200)
结论	(202)
第六章 长远预测	(204)
到 2000 年的增长预测	(205)
对 2001 - 2005 年的预测	(224)
另类预测	(227)
结论	(230)
1997 年以前大事年表	(232)
作者简介	(235)

走向 2010 年的中国： 改革的步伐

乔治娜·怀德 著
吴顺虎 王检贵 译
郑超愚 校

第一章 引言

充满活力的政府

中国拥有一个活力的政府进入 21 世纪，它提倡迅速而大胆的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相信，只要共产党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它就能继续享有一党统治的政治权力。为了在中国再次激发增长和促进市场发展，江泽民领导的政权决心沿着邓小平的脚步，改革国有企业部门。

团结在江泽民周围的领导阶层似乎确信，政治稳定和经济充满活力的结合是可行的，这能在不破坏政党权威的前提下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繁荣。

面对一些困难的选择

高层领导们在增长优先信念的支配下，也同意面向市场的变革方向。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混合经济：大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公共部门所有和管理，而小企业成为私营部分。福利供应、卫生、教育和基本的失业救济将由公共部门承担，私人部门将起补充作用。然而，住房和养老金供应将逐渐由人们日益增长的大量储蓄提供资金。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关闭、合并或以其他方式合理处置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同时，金融部门必须资本化和现代化。

但是，什么样的变革速度是最佳的这一问题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为了保证足够快的长期增长，以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福利，改革是必然的。如果变革激发反抗，削弱稳定或危及党的统治，那么中央政府将抑制变革。社会将承受以高失业以及打破阻碍快速城市化的户籍登记制度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动荡。但是对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而言，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动荡还不清楚。

亚洲危机的启示

对中国领导阶层来说，亚洲危机及其伴随的社会政治动荡包含一些深刻的教训。

在亚洲国家，由于轻率地借款、过快的扩张以及与发达国家过分密切的联

系，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大量的失业并失去了增长机会，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部门仍面临危机。这种景象加强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作为向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的一种渠道，从商业角度，尤其是从世界的角度而言是不可行的。过度的投资导致了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迅速积累，这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阻止过快的投资，也需要在作出借款决策时依据市场标准即对风险的确认与成本估算来确定。在几个亚洲国家，对腐败以及在企业和公共部门间关系缺乏透明度的指控强调了实施改革的紧迫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胜任的管理体制，令人信任它的公正无私。

1997年10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以及1998年初新任总理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议会）上宣布的政策都表明，中国已经很好地吸取了这些教训。尤其加快了金融部门改革的步伐。

谨慎的依据

亚洲危机为在经济改革中采用谨慎措施提供了论据，尤其是在中国开放其不发达资本市场的速度方面。资本市场的培育对长期资源的利用很重要。中国的外债还没有高到GDP的一定份额，并且它的管理部门还没有经受合理的外债支付状况的考验。但下一个10年，如果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并广泛扩张，中国将需要大量地输入外国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国资本和借贷的一揽子资金组合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稳定的环境及中国作为出口者（为借贷提供资金）和投资区域（吸引投资流入）的竞争力。这些考虑表明再次提高壁垒的预防措施是可行的。

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亚洲危机为江泽民领导阶层提供的最有说服力的教训可能是：经济变革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尤其在经济变革出了问题时。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不公开的争论，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党的长期生存是不可能的，党最终不能确保它的长期领导。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容易引起城镇选民，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恼火的反对意见，他们传统上是人民共和国的特权人员。由于过快变革产生的不利因素使得他们的反对易于表达出来的，当局可能倾向于谨慎从事。

改革将继续

本报告认为，国有企业部门仍将继续改革，但它不像政府新总理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和全面。新总理曾说改革进程将在2000年底以前完成。对外开放也

将继续，但它将以目前中国提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既定速度更慎重地前进。

关于改革进程的两个假设在本报告的预测部分提出来，并没有设想改革将在目前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完成。首先，假设改革将迅速进行，经济和社会的错位在短期也相当严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成就将把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带入到 1995 年捷克共和国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需要集体领导阶层的空前团结，而领导集体在 21 世纪初也将经历再一次的权力移交。第二个假设是改革将缓慢进行。大多数企业的长期生存主要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这些企业的资源需求将挤占另外一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投资和增长虽然一直相当强劲，但其速度将日益趋缓。短期来看，失业将降低，而增长将更快。但是，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将再次扩大，因为后者为了保持竞争力而加快了改革。

经济基础

在第二章，制造业、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改革时期中国增长的源泉。中国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增长周期，即自 1985 年来先过热后紧缩的阶段。先是 1987 - 1988 年，后是 1993 - 1994 年，过度的投资需求引发了通货膨胀压力，这也被同期进行的价格改革所加重。政府相应地采取紧缩政策，并控制物价。在第一阶段，严厉的措施导致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成千上万小型非国有企业关闭。第二轮的紧缩不那么严厉，采取的措施也更为恰当，强劲的出口支撑着经济增长，取得了通货膨胀回落与经济缓慢增长的软着陆。

在改革中，中国不寻常的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国内的高储蓄率，这支持了高投资率。虽然 90 年代初以来国内工业已积累了大量的市场剩余，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这确保了中国的外部账户保持着合理状态。这里分析了政府政策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渐进发展，如财政与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外国投资和贸易以及外汇等，也检验了低估中国经济规模和夸大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差错。

社会性

第三章描述了通过改革如何消除贫困，但是不平等扩大了。在农村，那些除了谷物生产还进行多样化生产的家庭，以及那些成员在农田以外找到工作的家庭大大受益。几百万所谓的农民事实上不再依靠农业为生。与此同时，政府把财政支出花在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能力由于权力下放而受到限制，因此，再分配的能力有限。几百万出生在农村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而他们在城市生存也不稳定，逐渐打破城市工人的铁饭碗正加剧城市的不平等和社会的紧

张。沿海和内陆的差距正在扩大。一支庞大的就业大军加剧了战胜失业的困难，教育和医疗体系也处于压力之下。环境恶化也相当严重。

增长的议程

第四章提出了本届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在国内的政治稳定，以及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和保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越来越自信地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修改的经济政策试图重构经济。增长和改革将结合起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鼓励上百万的劳动力离开土地来实现。国有部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改革也将继续。贫困的减轻和增长机会向内陆扩展是关键的目标。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逐渐增加。

国外投资体制也处于改革之中。但是，由于需要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将延缓开放资本项目，这样做甚至会延缓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因而进一步开放经济的愿望在不断地调整。

实现包括九五计划和 1995 - 2010 年远景规划目标的限制条件是突出的。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其他条件下是一种稀缺的要素禀赋，但现在比以前显示更小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原因是现在的廉价劳动力分布在内陆地区。不充足的基础设施是一个苛刻的限制条件。环境因素日益变得紧迫，但在追求增长和创造工作机会而前成为了第二位的因素。对大量失业的担忧抑制了改革者急于关闭破产企业的热情。事实上，地方政府经济上的自治也不能违背中央的目标，领导阶层的集体性本质使他们先考虑限制领导阶层大胆创新的欲望。

对 2010 年的预测

第五章提出，要是政府坚持业已勾画出的改革方案，增长在长期确实会快速进行。但是，如果担忧改革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中止改革，增长将急剧放慢。基于对中国政府及其他实施政策的本质的两种假设，对经济、就业和外部账户到 2010 年的预测用表格形式来表示。一个假设是迅速的改革将沿着朱镕基总理在 1998 年初阐明的轮廓继续进行。对国有部门的快速重组，以及基本上立足于私人储蓄的福利体系的创建，在改革之初将放慢经济增长。因为制造业的增长急剧减慢，社会动荡相当严重，失业也将狂增。第二个假设被认为更合理，它更谨慎地涉及国有部门的改革。因此，在预测期内的开始阶段，增长率较高，而失业将减少。但长期来看，从 2000 年后的 10 年起，尤其是从 2005 年后起，庞大的国有部门对国有资源的需求将使经济增长率减慢到大约 7% 以下，而一般认为，7% 的增长率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大军就业需要的合意增长率。

第二章 经济基础

中国的改革期从由工业主导的经济开始，这种情况在 20 年后仍然如此。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 1980 年接近 40%，到 1995 年还一直占到 38%。尽管最初的改革是从农业中爆发的，但农业的比例已萎缩到 20% 左右；服务业在改革以前的经济中，除国家提供以外只占很少部分，现在虽有增长但还不够发达。

从需求角度看，投资和出口驱动了经济增长。在 1985 - 1995 年的 10 年间，由投资增长驱动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9%，即使用东亚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也相当高。强劲的出口增长，尤其是东部沿海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支撑着经济。

自 1985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个先过热后紧缩的经济周期。第一次在 1987 - 1988 年，然后是 1993 - 1994 年，过度的投资需求引发了通货膨胀压力，而价格改革更加重这一压力。政府相应地采取紧缩政策，并控制物价。在第一阶段，严厉的措施导致了在农村发展起来的几千个非国有制小企业关闭。在第二次，紧缩不那么严厉，采取的措施也更为恰当，强劲的出口支撑着经济增长，取得了通货膨胀回落与经济缓慢增长的软着陆。

在改革中，中国不寻常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国内的高储蓄率，这支持了高投资率。虽然 90 年代初国内工业已积累了大量的市场剩余，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活力作出了贡献。这保证了中国的外部账户保持着合理的状态。

供给面

农业日益减弱的作用

中国的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就就业而言，在传统上最重要的部门是农业（包括林业、牧业和渔业），1996 年它占用了 32910 万劳动力，这占总共 49035 万“农业劳动人口”的 67%。而后者占全部总劳动力（68850 万）

的 71.2%。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 20 年后，48% 的经济活动人口一直从事农业。事实上，几千万（估计高达 8000 万到 1 亿）官方划分的农村工人已经非正式地离开了农村，到城市（主要是东部沿海）寻找工作。

经济中其他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农业以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 份额已从 1979 年的大约 31.2% 下降到 1995 年的 20.6%（表 2.1）。

表 2.1 GDP 的部门构成

（当年价格；占全部的 %）

	1979	1985	1990	1995
农业	31.2	28.4	27.2	20.6
工业*	47.4	43.1	41.6	48.4
其中：				
采矿和采掘业	1.4	1.2	1.3	1.4
制造业	40.2	35.4	33.6	37.6
服务	21.4	28.5	31.3	31.1

* 注：包括建筑和公用事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分散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稳定》，《2020 年的中国》。

改革之初增长迅速的部门成为某些担忧的来源

自从 1949 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采取了苏联式的重工业政策，全部资源用于建立工业基础。改革后期也不例外。但在改革之初再次实行家庭农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订购价格大幅上涨，农业快速增长（1979—1985 年平均增长 6.5%）。在决策权和收益权归农户，从而容易得到的收益枯竭时，农业增长率就放慢了。在 1986—1995 年这 10 年间，农业仍保持一个相当快的（年均 4.2%）增长率。

大体而论，保持农业增长，以及在生活中必需品方面满足自足或接近自给自足这一相互冲突的目标，并为以动物为基础的饮食结构提供足够的原料，这样，经济的繁荣是令人鼓励的，而这对农业的要求也成为焦点。尽管农业每年获得了接近 5 亿吨的大丰收，但主要因为谷物贮藏和运输体系中浪费严重、设施不足，中国还是大量地进口谷物（1997 年达到 420 万吨）。除非中国能提高使用农业投入要素的效率（尤其是水和化肥），减少已收割谷物的浪费并放慢把土地挪作它用的速度，否则就会出现一些担忧：对进口的需求大到足

以推动世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持续增长的关键是，需要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增加投资、消除在不发达地区存在的大量贫困。这意味着，小规模普通农场、使用期的不确定以及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持农业发展的公共投资的低效率都阻碍了农业增长。

非生活必需品的产出增长强劲：许多农户根本不是依靠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从事水果或蔬菜种植发财致富。这主要是由于价格信号：谷物价格至少部分受到控制，而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全面放开，进入城市市场的农户能够利用城市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

面向国内市场的多元工业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受到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

1949 年后，发展政策的要点是工业化。在 1962 年与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意味着，成千上万工业企业的建设实际上要依靠从农业中抽取大量的剩余，因此压制了农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加强了工业化建设。由于担心苏联和早些时候来自美国或台湾的入侵，交通网络向远离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伸展，这意味着需要大量投资。工业设施，尤其是技术相对先进的设施经常设置在内陆地区，那里远离市场，远离生产投入要素。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控制力受到削弱，各级地方政府自给自足的雄心抱负得到了增强。对全国范围内交通体系的忽视阻碍了省际之间市场和贸易流通量的增长；实际上，各省都不考虑什么优化资源配置，而是广泛发展工业生产，结果是 1979 年经济中制造业已占到 GDP 的 40%，但却不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有意识地努力推动出口，而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这增加了制造业增长的动力。1980—1985 年，制造业产出年均实际增长 9.6%，以当年价格计算达到 GDP 的 35.4%。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1979 年以来，这一指标降低了。20 世纪 90 年代，在出口以及成千上万个所谓的外资企业的推动下，制造业增长率大幅度上升。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尽管世界上 500 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大约 200 个已经在中国投资建厂，但大多数外资企业仍是由香港或散居海外的华人投资，他们大多经营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业。到 1996 年底，大约有 24 万个外资企业，从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到小规模简单加工企业。在 1986—1995 年 10 年间，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 12.5%（见表 2.2），占 GDP 的比例从 35.4% 上升到 37.6%。1980 年出口产品中制造业的比例是 49.7%，到 1996 年，这一指标已超过 80%；1997 年，外资企业占全部出口的 41%，占进口的 54.6%。